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2.001

# 退出—呼吁动态、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

## ——一个新的制度变迁动力学模型

杜长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办公厅,北京 100846)

**摘要:**制度变迁为何及如何发生?已有的诸多相关理论虽富于启发性,但忽视了制度需求的显示难题,留下了制度供给的诺思悖论,从而未能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本文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互动的角度构造了一个新古典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其中,退出—呼吁动态刻画了制度需求,而制度绩效位差造成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刻画了制度供给。在对退出—呼吁动态的响应中,制度竞争通过发现效应、创新效应、扩散效应和保障效应推动了制度变迁。这一工作有望为分析制度变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制度需求;退出—呼吁动态;制度供给;制度竞争;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7)02-0005-08

作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之一,制度变迁问题近几十年来一直占据着制度经济学家研究议题的中心位置。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是新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的,也有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然而,当前的研究由于舍弃或疏漏了制度均衡思想,<sup>[1]</sup>从而未能清楚地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是什么。一旦将视线转向“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总体制度变迁时,也就难以有效回应“改革的道路在哪里”、“如何破解改革中梗阻”等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拟从学术角度引入“制度市场(Institutional Market)”概念,将制度变迁理解为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从旧的均衡转到新的均衡的过程,进而基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互动构造一个新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下围绕退出—呼吁动态和制度竞争阐释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机制。

### 一、制度变迁的双重困境

#### (一)制度需求及其显示难题

由于制度具有生产性和激励性,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包括信息费用、代理费用、不确定性产生的成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成本等,所以人们总是存在着对制度的需求。尽管可以在理论上刻画制度需求,但在经验观察中却难以识别其存在。其原因在于:一是受制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等缺陷,制度需求者不能精确地描述潜在的获利机会和相应的新制度;二是现行制度往往将其他可能的制度选项排除在选择集合之外;三是与现行制度相一致的习俗禁忌、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控制使得需求者不愿表达制度需求;四是“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存在,使得制度创新者的收益不能完全内部化,降低了个人显示制度需求的意愿。制度需求的显示难题意味着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社会最优水平,这一推论无疑是令人悲观的。因此,对制

收稿日期:2017-0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103133)

作者简介:杜长征(1980-),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处长,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度需求从而制度变迁动力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制度需求显示的具体技术、行为和机制层面。

## (二)制度供给及其诺思悖论

关于制度供给,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技术和要素相对价格等因素的变化,市场上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理性的经济人为利用获利机会,通过自愿交易与合作促成制度创新,实现制度供给。但由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存在,交易双方很容易陷入互相背叛的“囚徒困境”。在真实的非重复博弈市场环境中,克服“囚徒困境”必须引入第三方监督和惩罚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因为国家在实行强制性惩罚方面具有专业化优势,在保护和实施产权方面享有规模经济。然而,国家在制度供给上是有效率的吗?未必如此。从理论上讲,一个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实施契约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导致无效率产权安排的发生和经济的衰退。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sup>[12](P20)</sup>“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sup>[12](P25)</sup>这就是著名的“诺思悖论”。

## 二、作为制度需求表达机制的退出-呼吁动态

### (一)作为制度需求信号的退出-呼吁行为

既然制度需求是难以显示的,那么要对其进行描述或者哪怕是猜测,就必须在经验观察中“捕捉”到某种需求信号。赫希曼<sup>[3-5]</sup>把两种典型的用于表达“不满”的行为——作为市场行为的“退出”和作为政治行为的“呼吁”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为分析制度需求信号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典模型。赫希曼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具备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松弛”(Slack)也会不期而至。由于剩余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松弛也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松弛问题不仅是组织所独有的,制度也会面临松弛问题。松弛的治理需要由退出和呼吁行为构成的挤压机制(修复机制)。赫希曼强调,管理阶层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发现松弛问题:一是某些消费者不再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某些会员退出组织;二是消费者或会员要么径自向管理者及其上级申诉,要么以一般抗

议的形式向任何关注他们的人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因此,退出-呼吁行为就成了显示商品、服务或制度需求的信号。<sup>①</sup>

消费者的退出或呼吁选择无疑应该视为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选择。不考虑退出和呼吁行为在成本和收益上的相关性,只有在退出或呼吁的收益大于或至少等于其成本时,消费者才会选择退出或呼吁。赫希曼认为,退出和呼吁两种选择都有修复松弛问题的功能,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各有侧重。一般地,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退出,因此退出行为对于抑制价格上涨较为有效。相反,质量敏感型的消费者则倾向于选择呼吁,因此呼吁行为对于抑制质量下降更为有效。当存在质量阶梯时,呼吁在遏止优质产品质量衰减过程中能发挥较大作用,而在遏止劣质产品质量衰减中作用较小。当存在竞争差异时,呼吁机制在改进垄断性产品的质量方面更有效率。相反,退出机制在竞争性产品的质量改进上更有效率。此外必须承认,退出-呼吁行为在修复组织或制度的松弛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 (二)退出-呼吁动态

对退出-呼吁行为,不仅要把握其内涵、类型、机制与功能等静态内容,还要把握其动态内容,后者更为重要。从退出-呼吁行为的发生环境来看,不同的组织或制度对退出或呼吁有不同的敏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退出或呼吁的报酬结构。在一定环境中,退出-呼吁行为是对产品质量下降或价格上升问题的反应。其中,质量下降问题看起来更重要一些。赫希曼通过改造传统的需求曲线,使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变成质量的函数,描绘了一幅质量下降时的退出-呼吁图景,但忽略了环境变化所造成的“需求质量弹性”变化即退出对质量下降的敏感程度,从而舍弃了需求质量弹性变化时的比较动态分析。笔者在此借鉴赫希曼的思路,把质量下降问题具体化为制度质量下降即制度僵化问题,并引入环境变化导致的需求质量弹性变化,建立了一个比较动态模型(见图1)。

在图1(a)中,纵轴表示负的制度质量,横轴表示一个地区的居民数量。在图1(b)中,横轴仍然表示居民数量,而纵轴则表示个人驻留(Stay)在当地不退出的成本,可以用人头税之类的政府垄断租金来度量。在(a)图中,当制度质量从 $Q_0$ 下降到 $Q_1$ 时,制度需求量从 $N_0$ 下降到 $N_1$ 。表明有 $(N_0-N_1)$ 的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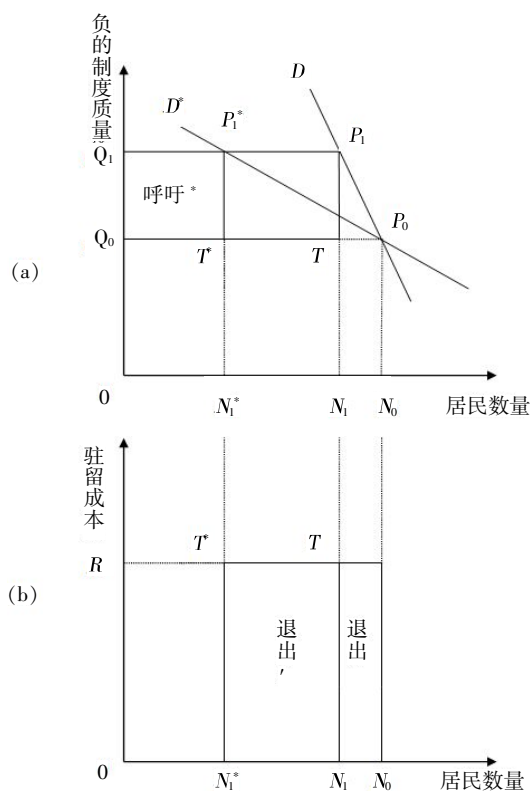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质量变动与退出-呼吁比较动态

退出了该地区。考虑到制度刚性,人均驻留成本保持不变,则(b)图中的矩形“退出”相当于政府垄断租金的总耗损,即制度退出的总规模。此时,(a)图中的矩形  $Q_0Q_1P_1T$  代表了驻留下来的  $N_1$  个居民所承受的质量下降的整体程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代表了总的“怨言”即呼吁规模。<sup>②</sup>

现在考虑行动环境变化的情形。当环境变化时,退出可能变得更容易,如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变迁的总趋势所显示的那样。结果,退出对制度质量的下降变得更敏感,表现在(a)图中就是制度需求曲线变得更平缓。假设现在需求曲线扭转到了  $D^*$  所示的位置。当制度质量从  $Q_0$  下降到  $Q_1$  时,制度需求量从  $N_0$  下降到  $N_1^*$ ,总的制度退出规模可以用(b)图中的矩形“退出”加“退出'”来表示,其中“退出'”代表了新增的退出规模。此时,总的怨言或呼吁规模相当于矩形“呼吁\*”,比矩形  $Q_0Q_1P_1T$  的面积小。很显然,当需求质量弹性发生变化时,退出和呼吁两种行为的效应或作用力具有替代性。

### 三、作为制度供给强迫机制的制度竞争与制度均衡

#### (一)作为制度供给强迫机制的制度竞争

国家的权力天然地大于个人或企业的权利。如

果权力不受约束,政府对市场随意干预的倾向很难自我抑制。当国家机会主义扭曲了社会报酬结构时,理性的经济人便缺乏投资激励,或做寻租性的扭曲性投资。幸而“统治者总存在竞争对手”,<sup>[2](P27)</sup>因而总存在硬化国家机会主义约束的制度竞争。“竞争”<sup>③</sup>所依从的“丛林法则”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制度竞争”<sup>④</sup>迫使不想自取灭亡的统治者改弦更张,变法图强,从而为制度供给提供了强大的压力机制。有了制度竞争的驯服机制,国家权力才不会变成吞噬社会的“利维坦”(Leviathan)。<sup>[6]</sup>关于制度竞争给制度供给带来的刺激,诺思有过一句经典的论述:“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形下,相对无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者面临着或者灭亡,或者修改基本所有权结构以使社会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增长率的选择。”<sup>[2](P29)</sup>

只要存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存在着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市场状况、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就必然存在着制度绩效的有高有低的差异,具体表现为自由度大小、人均财富多寡、经济增长快慢以及经济发展可否持续。这种差异可以称为“制度绩效位差”。制度绩效高的国家或地区对低绩效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有潜在的吸引力,通过引发其退出或呼吁行为而引发制度竞争。退出-呼吁状况是观察制度竞争的重要指标。当然,除了退出、呼吁等较和平的竞争渠道,还有战争、吞并等非和平的渠道。

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直接表现为政府之间的制度供给竞争。不论是国家政权还是地方政府,大都处在一个竞争性网络里。<sup>[7]</sup>如今,“竞争性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s)越来越流行。竞争性政府与企业很相似,科斯就曾经把政府比作“超级企业”。对于竞争性政府来说,制度可以理解为其准私人产品,由其供给并由其获得垄断资金(收益)。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之间,制度竞争带有市场竞争色彩。制度竞争局面加剧了退出-呼吁威胁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强化了对政府制度供给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二)制度竞争与制度均衡

制度供给的成效归根结底要反映在对制度需求的满足上,即制度均衡。所谓制度均衡,是指制度供求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中,制度变动的净趋向为零,制度基本稳定不变。制度均衡可以区分为变量

均衡和行为均衡。在变量均衡实现时,制度的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不存在供给缺口或需求缺口。此时不存在只有在别的制度中才能利用的获利机会,消费者无意改变现有的制度。变量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在现实中,由于难以测定准确的制度供给量和需求量,判断制度均衡实现与否主要是看是否实现了行为均衡,即不存在制度消费者对制度的“不满”。换句话说,在消费者有退出-呼吁权利时,没有发生退出-呼吁行为。制度均衡的实现途径是制度竞争。其基本过程是,制度竞争激发了退出-呼吁行为,向潜在的制度供给者显示了制度需求,进而影响到制度供给者的垄断租金和执政合法性,从而刺激了制度供给,实现了制度均衡(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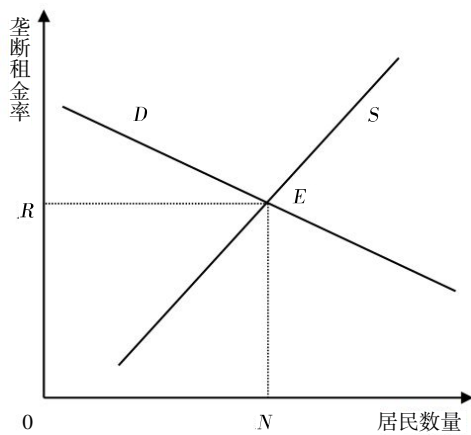


图2 制度竞争下的制度均衡

图2中,纵轴表示以政府的垄断租金率衡量的制度价格,也可以说是居民驻留(Stay)在当地的成本,可以用税率来代表。横轴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数量(暂不考虑居民中个人与企业的区别)。制度需求曲线D向右下方倾斜,意味着随着制度价格上升,用居民数量来表示的制度需求量也随之递减。由于存在国家或地区之间比较充分的制度竞争,需求对垄断租金率变化的弹性更大,曲线因而较为平缓。制度供给曲线S向右上方倾斜,意味着随着垄断租金率的上升,国家愿意服务更多的居民,即国家服务的“公共性”不断扩展,提供更多的制度产品。图中的N是一个国家的居民数量。该国居民在制度竞争中选择退出或呼吁来显示制度需求。此处假定:居民拥有关于国家间税收或服务组合差异的完全信息;退出或呼吁是无成本的;存在许多国家,足以使每一个居民住在一个正好满

足自己需求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服务模式都是根据该地原有住户的偏好来设定的;各国之间不存在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还没达到最优规模的国家试图吸引新的居民,超过最优规模的国家做法正好相反,处于最优规模的国家则力图保持其人口数量不变。

根据制度行为均衡的定义,该国实现制度均衡时,不存在居民的退出或呼吁行为。制度均衡实现的过程如下:假设该国向其居民征收一个高于R的垄断租金率,必然会造成一定规模的退出,从而导致租金损失。尽管提高了租金率之后有租金增量,但在需求租金率弹性大的情况下得不偿失。提高了租金率又带来了呼吁和怨言,造成心理损失。因此,理性的国家会被迫选择退回到E点。在那里,没有退出,也没有呼吁。相反,如果该国面对一个低于R的垄断租金率,将会吸引一定规模的外国居民涌入,此时制度供给量小于需求量,造成拥挤效应,制度质量随之降低,从而引起怨言特别是国内居民的怨言,已经涌入的外国居民将被迫退出。此时,该国政府向上提升租金率只会减少呼吁,增加租金收入。供给与需求仍将在E点相交,不再有退出或呼吁,制度实现均衡状态。E点就是制度均衡点。

#### 四、退出-呼吁动态、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

##### (一)退出-呼吁动态、财政-执政压力与制度发现

制度竞争对国家或政府的制度供给起到了强化作用,但它更多地是一种趋势性力量,而国家自身的财政-执政压力往往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催化剂。“熊彼特-希克斯命题”<sup>[8]</sup>指出,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因,历史上因财政赤字甚至破产而导致变法或改革的例子屡见不鲜。财政压力的形成往往与退出-呼吁行为有关。在典型的“蒂布特式”税收竞争或财政竞争局面中,企业外迁、资本外逃等退出行为意味着税源流失,而过度的群体性呼吁将损害发展环境,导致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下降,从而导致财政收入下降。除了财政压力,执政压力也可以成为国家变革制度的诱因。在导致执政压力的各种因素中,退出-呼吁行为十分重要。退出是一个象征着脱离管辖的举动,直接削弱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诸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怠工”等隐性退出行为也有类似的效应。“呼吁”固然意味着仍服从政府的管辖权,但也意味着不再接受具体的管辖制度或措施,也会带来执政压力。

“穷则思变”。财政-执政压力对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主要在于:造成了一个“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压力场”,从而使得政府有机会发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破碎地带。从政治经济史来看,改革的突破口往往选择在压力最大的地方。<sup>[9]</sup>此时,政府有两种修复制度绩效的选择:一是降低垄断租金率,从而也降低居民的驻留成本;二是提高制度质量,从而也提高居民的满意度。考虑到政府所面临的紧迫的财政压力,降低租金率是一个非合意策略。因此,在制度变迁的最初期,政府倾向于选择提高制度质量。其具体方式,可能是政府强制性推出制度创新,也可能是认可并保护民间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正如1978年安徽省政府认可和保护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试验所显示的那样。因此,即使不引入国家或政府竞争因素,仅仅依靠隐性退出-呼吁模式和财政-执政压力机制,也能够独立地引发制度创新,尽管这种边缘性创新未必持久。其可持续性依赖于充分的制度竞争。

### (二)退出-呼吁动态、制度竞争与制度创新

在对财政-执政压力的积极回应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程随之启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绩效位差也相应产生,制度竞争开始发挥作用。通过强化退出-呼吁机制,制度竞争刺激了政府的制度创新。当制度需求是质量的函数时,即当居民的制度需求量取决于制度质量状况时,制度竞争对制度创新的刺激效应可以在图1中得到阐明。在(a)图中,需求曲线D在制度竞争下变得更加平缓,即需求对质量变动的弹性更大,等量的质量下降将导致更多的退出,财政压力随之加剧,政府被迫推出更多的制度创新来抵消质量下降的不良后果,此时制度创新用曲线D向右的旋转或平移来间接地表示。

当制度需求是垄断租金率的函数时,制度竞争导致需求曲线向左旋转或平移。以图3中向左平移的情况为例。平移之后,均衡的垄断租金率和居民数量都下降了。显然,竞争导致了退出。此时,政府的垄断租金规模减少了。在不能提升租金率的硬约束条件下,政府可以选择将制度供给曲线向右平移,在降低租金率的同时获得居民回流的收益,使总租金增加。此时制度创新可以用供给曲线S向右的旋转或平移来直接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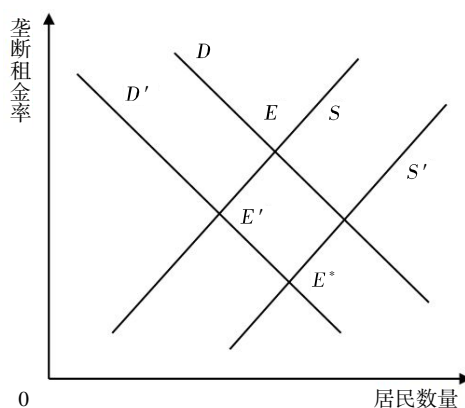


图3 制度竞争与制度创新

随着制度竞争的不断深入和强化,制度供给者的适应性和竞争力逐渐增强,制度创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其基本的类型只有两种:一是创业性的(Entrepreneurial)或体制性的制度创新;二是管理性的(Administrative)或机制性的制度改进。在制度供给者对退出-呼吁行为的敏感性方面,前者对呼吁行为较为敏感,而后者对退出行为较为敏感。两种创新方式在现实中往往被结合起来使用,以达到最佳效果。

### (三)退出-呼吁动态、制度竞争与制度扩散

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了制度创新,自然就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扩散。通常说来,有五种接受外来新制度的方式:一是启示,即在观念上开始认同新制度,尽管还没有在实践中采用;二是复制,即无任何改变地接受;三是模仿,不是简单地复制新制度,而是吸收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四是混合,就是把新旧制度掺杂在一起;五是集成创新,即在混合的基础上作出适应性的改造,或者说“消化吸收再创新”。制度扩散的基本过程是:在制度竞争中,某个国家率先推出制度创新,将对其他国家的居民产生吸引力,引发其退出-呼吁行为,其他国家将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领先者的新制度,从而造成制度创新的扩散。为描述这一过程,笔者建立了一个两国条件下的制度扩散模型(见图4)。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彼此相邻的国家A和B,各自的居民都有退出或呼吁的充分权利和能力。为简化分析,假设两国的人口均为 $N^*$ ,并假定A国的制度需求曲线即B国的制度供给曲线,A国的制度供给曲线即B国的制度需求曲线。在初始状态下,两国在E点实现了制度一般均衡,其时各国人口为 $N^*$ 。现在假定A国在外生冲击或内生演化下发生了

可见的制度创新,其制度供给曲线 $S_A$ 向右平移到 $S_A'$ ,此时 $E'$ 是A国的制度行为均衡点,但对B国来说却不是:一方面,有一定规模的居民退出本国,迁到A国;另一方面,余下的本国居民却要面对一个高于A国的垄断租金率,在攀比之下,必然要发出呼吁。B国为了消除退出-呼吁行为所引发的财政-执政压力,不得不引入A国的新制度,表现在图上就是供给曲线 $S_B$ 向左平移到了 $S_B'$ 。B国的制度均衡点将移动到 $S_A'$ 上 $E'$ 的左下方,而且只有移动到 $E^*$ 点才能完全消除退出-呼吁行为。此时A、B两国再度实现制度一般均衡。在这个模型里, $S_A$ 向右平移到 $S_A'$ 代表着制度创新, $S_B$ 向左平移到 $S_B'$ 代表着制度扩散。制度扩散的最终效果是弭平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绩效位差,实现了制度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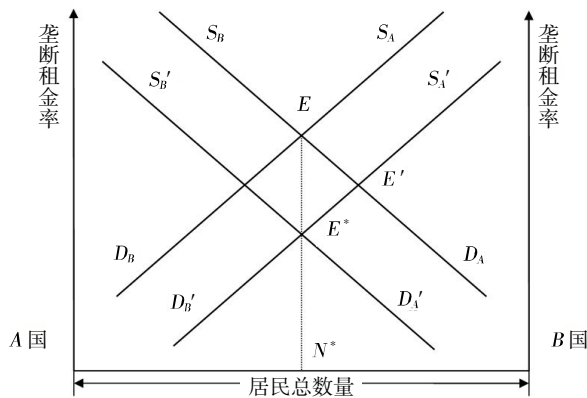


图4 退出-呼吁动态、制度创新扩散与制度一般均衡：一个两国模型

#### (四) 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的可持续性

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制度创新的扩散和制度一般均衡的实现,制度变迁得以完成。问题是,从更长时期来看,制度变迁是可持续的吗?不难发现,历史上有过许多由国家推动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创新往往表现为对来自社会的制度创新需求的让步或妥协,愈是在危机时期愈是如此。但历史也一再证明,这种让步或妥协随时都有可能收回,因此而发生的制度变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有几种形式:一是完全不可预测未来的变迁方向;二是不可预测未来的具体方向,但可以大体上确定一定的变迁范围;三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方向,但变迁可能发生在具有替代性的不同路径上;四是方向和路径完全清晰。

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或可持续性,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市场控制力,或者说垄断性,而

后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规模。国家的领土规模越大,居民的退出或迁移越困难。人口规模越大,以集体行动形式开展的呼吁越困难。因此,大国在制度市场上的势力大,小国反之。二是竞争性国家的数目。一般来说,某一地理区域的国家数目越多,“碎片化”(Fragmentation)程度越深,单个国家的市场控制力越弱,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越激烈,最典型的例子是欧洲特别是西欧。三是竞争性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竞争性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是均衡,就越是有利于国家之间竞争的长期化,并将促使国家之间采取一种和平竞赛的方式,而不是试图实行合并或吞并等一体化策略,制度竞争因而能够更持久。四是竞争性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结构的相似性。相似性越强,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制度同质性越强,居民退出或呼吁的交易成本越小,制度竞争越激烈。

现代社会的重视共识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于制约和监督国家权力而言,制度竞争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制度竞争保障了制度变迁的可持续性,减少了不确定性。结合制度市场结构特征,制度竞争对制度变迁的保障效应可以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当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垄断时,制度变迁的未来是完全模糊的;当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寡头时,制度变迁的方向是有一定范围的,但具体路径不确定;当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时,制度变迁的方向是确定的,但具体路径不确定,存在着几种替代性和差异化选项;当主导性制度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时,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基本消失,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完全清晰(如图5所示)。<sup>⑤</sup>

总之,本文从学术角度引入“制度市场”概念,将制度变迁理解为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从旧的均衡转到新的均衡的过程,进而基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互动,建立了一个“退出-呼吁动态、制度竞争与制度变迁”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其中第一次把退出-呼吁动态纳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为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在具体运用时还需要结合制度变迁的实际作适应性改造。比如,在运用这一框架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时,不难发现改革过程中“中央管控式地区制度竞争”的真实场景:企业和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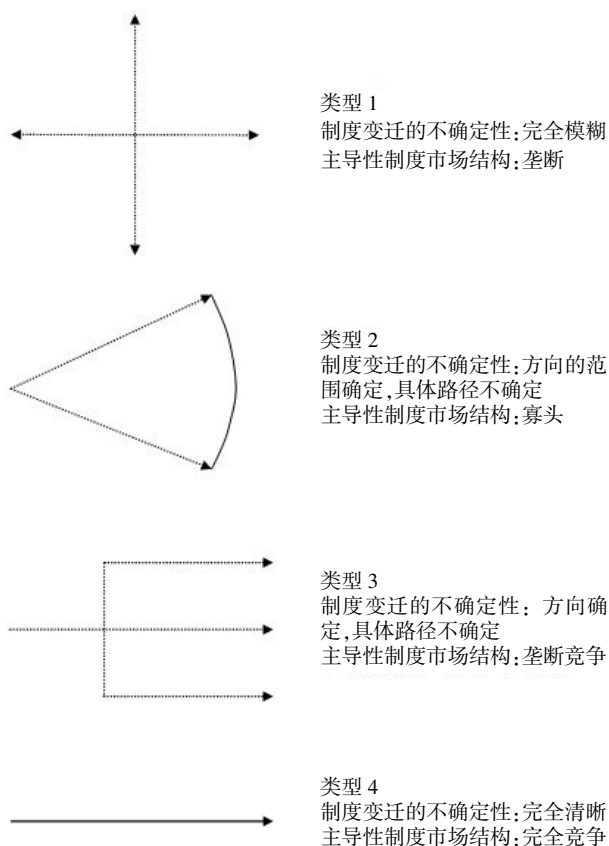


图 5 制度竞争对制度变迁的保障效应

显示制度需求,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决定制度市场结构。在退出-呼吁机制和国际制度竞争的驱动下,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构建了不同的地区制度市场结构,而退出-呼吁行为与地区制度竞争的互动构成了改革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有必要积极稳妥地发挥地区制度竞争的有益作用。

注 释:

- ① 当然,对退出-呼吁行为的类型学要作更全面的把握。消费者的联合抵制(Boycott)就是处在退出和呼吁边界上又兼具两者特征的特殊现象。消费者除了退出或呼吁还可以选择忠诚(Loyalty),除了忠诚还可以选择冷漠(Neglect)或沉默(Silence)。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忠诚-冷漠因素纳入到退出-呼吁分析中,对于深入研究制度需求的显示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
- ② 需要注意的是,代表呼吁规模的矩形面积不能与代表退出规模的矩形面积简单比较或直接相加。
- ③ 竞争在经济学中占有核心地位,但经济学家对于竞争的理解常常是狭隘的。竞争通常被限定于经济主体在市场

上展开的价格角逐。经济学家谈得最多的便是“价格竞争”。然而,在现实中竞争既不必限于“市场”,也不必限于“价格”,更无所谓“完全竞争的条件”。因此,如果要使竞争理论对现实有更强的解释力,经济学家就有必要转向乔治·施蒂格勒提出的竞争定义:竞争系个人(或集团或国家)间的角逐;凡两方或多方力图取得并非各方均能获得的某些东西时,就会有竞争。

- ④ 实际上,制度竞争并非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所独有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争或竞赛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重要传统。
- ⑤ 这些理论分析只是为了表明在制度供给中引入竞争因素对于保障制度变迁可持续性的价值,特别是在趋势意义上,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制度竞争程度越高越好。因为过度的特别是无序的竞争势必会稀释制度创新带来的租金,降低制度市场对制度创新的激励,不利于提升制度供给的质量。

参考文献:

- [1] 黄卫华,商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对制度均衡思想的疏漏[J].经济纵横,2005,(7):44-46.
- [2] [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3] Hirschman, A. O..Exit, Voice, and Loyalty: Further Reflections and a Survey of Recent Contributions [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4,(13):7-26.
- [4] Hirschman, A. O.. Exit and Voice: Some Further Distinction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66):386-89.
- [5] Hirschman, A. O.. Exit and Voice: An Expanding Sphere of Influence [A]. Hirschman.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 [C].New York: Viking, 1986.77-101.
- [6] Thomas Apolte. How Tame Will Leviathan Become in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among Governments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J].Public Choice, 2001,(107):359-381.
- [7] Bratton, William W., McCahery. Joseph A.. The New Economics of 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Devolutionary Federalism in a Second -Best World [R]. Faculty Scholarship,1997.
- [8] 盛洪,张宇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9] 周冰,马宁.中国平滑式转型启动的经济学原理[J].南开学报,2006,(2):109-115.

(责任编辑:许桃芳)

## Exit–Voice Dynamic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 New Kinetics Model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DU Chang–zheng

(Department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China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Beijing 100846, China)

**Abstract:** Why and how does institutional change occur? Although existing theories are quite inspirational, they could not reveal its internal dynamics with the neglecting of difficulties for displaying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left with the "North Paradox"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This thesis intends to find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with the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this approach, the Exit–Voice dynamics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 and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brought by institutional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veals the institutional supply. In response to the Exit–Voice dynamic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will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discovery effect, innovation effect, diffusion effect, and guarantee effect. Therefore, this would be a new perspective for analyz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demand; Exit–Voice dynamics; institutional supply;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